山东蟋蟀谱

SHANDONGXISHUAI

柏良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内容提要

鲁虫之硬辣，震动古今虫坛，享誉大江南北。本书精辟地阐述了鲁虫的品相、虫源、出将条件、斗限洞察、分段育将、排蛉法则及近代鲁虫出将品类等有关蟋蟀的选、养、斗技巧与经验，并对全国各地虫友对鲁虫产生的疑惑——作了解答。此外，本书还收集了近代鲁虫出将品类照30幅、功虫照15幅，并简要介绍了这些将虫的形态特征及它们的骄人战绩。

本书可供广大蟋蟀爱好者和捕虫、育虫者参考。

柏良印象

—— 序1

柏良先生的新著《山东蟋蟀谱》将付梓，他屈尊嘱我作序，实感惶愧至极。柏良先生再三相邀，盛情难却，只得勉为其难。待到落笔，却不知从何说起。因为，对鲁虫的了解，我尚处于不断学习摸索阶段，要对鲁虫资深养家的精辟论述说三道四，实在是班门弄斧，太不相宜。踌躇再三，觉得还是说说我对柏良先生的印象较为适宜。

认识柏良先生，是从他的《秋战韬略》开始的。1999年秋，我在宁阳泗店街头看到此书，以高于书价四分之一的价钱购回，收虫间隙展读，欲罢而不能，以至第二天因读此书而一天未去虫市。读完此书，深感柏良先生对鲁虫的研究精深入微，独树巨帜，可谓是研究鲁虫的第一本传世之作。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鲁虫在大江南北声誉鹊起，十余年来，虫友都深感对鲁虫的了解不够，普遍冀求有一部专谈鲁虫的经谱好好学习学习，《秋战韬略》应时而至，令人耳目一新，大有启迪。于是，一下子购了30本，推荐给苏州同好，一两天后，读过《秋》书的虫友都告知："煞渴"(南方话，即过瘾、解渴之意)。由此，也产生了结识柏良先生的愿望。

千禧年秋，应济南蟋协之邀，参加全国邀请赛，会上，与同窗王欣荣兄的好友王连仲君相识，正好连仲兄是



《秋》书的序作者，当晚便由连仲兄陪同造访了柏良先生。也许是我和柏良先生都长期在机关工作，又同为政协委员，更兼对秋虫的痴迷，因此，心存灵犀，不须多说，便一见如故，相聚甚欢。柏良先生还将所蓄将军一一展观，一条条俱是骨格清奇魁伟，英气毕现，色相神俱佳，顿觉眼界大开，深心钦羡。临行，柏良先生送至楼下，作苏州再晤之约。

近冬时节，柏良先生由上海黄进等先生陪同，冒寒如约来苏。苏州蟋协的七八位同仁，早早相候，相见恨晚，十分欢畅，彼此交流切磋，当然是柏良先生答问为多。苏州同仁中有不少提问均属多年不解的疑难问题，柏良先生侃侃而谈，精妙入里，虫友们均感到柏良先生对鲁虫可谓知之甚深，细而入微。苏州的毛锡祚君是姑苏资深养家，也是我多年知交，他为人耿直，平时从不随便夸人，席间却对我说："柏良先生不愧为真行家，确有真本事！"他还提议柏良先生在苏州收徒，此议一出，举座响应，苏州一位后起之秀被推荐为柏良先生门下，于是，此次欢晤更添了许多情味，成为一段佳话。

新世纪第一个秋季，我和柏良先生的友情又进一步升华，他知我患中度白内障，视物易误，竟两次专程从济南



驱车赶来宁阳，陪我收虫。两三天相处，使我对柏良先生有了更多的感知。我发现，从虫季初、中阶段，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为虫友牺牲的，北京、天津、上海、济南各地的虫友慕名而至，求他相助，他都是有求必应，慷慨不吝，而且还要解囊款待。当地的农民也都视他为师友，纷纷先将好虫送给他审视，他也会将虫的优劣细判给农民听。与他相处，均有得益，我也是感同身受。一天中午，我去柏良先生住处小坐，一位虫友收来一条大虫请柏良先生审视，他抬起眼镜一望，高呼："好蛐蛐，是条琥珀青！"近几年来，早就听说山东名品琥珀青，却从未谋面，赶紧凑近细观，发现此虫体形壮实，颜色却极淡，头盖是极淡的咖啡色，若按南方习惯，这类虫属嫩虫不收之列，我不竟将信将疑。回到苏州，在小友刘定伟、马树生共养的虫中，赫然见到一条七厘半的琥珀青，因我大虫不多，便移赠给我。盆养之初，总觉头色太嫩，牙也不够大，但体壮食旺，养至深秋，此虫顶门变黑而浓，遍身干而无光，微青项及背上，满布砂璨，肉白牙红，动步生威。上场试口，连发重口，将一条名将白牙青杀得落荒而走。第二场更是惊心动魄，遇到一员枭将红牙青，一连几十口，口口有声，造桥夹、链条夹始终不脱口，琥珀青杀得性起，一个发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重口，将红牙青摔至栅角，尾翘身颤，步不成形，满场惊叹：琥珀青名不虚传。仅此一例，足可证明，柏良先生对鲁虫真是见多识广，非一般养家所能企及。

在我印象中，柏良先生是一位作风严谨、处事认真细致之人，但又灵活而不刻板，这可能同他长期从事外经领导工作有关。即便是选蓄秋虫，亦是如此。每年虫季前，他会驱车去各地踏勘，了解水旱墒情，做到对各产地情况了然于胸，然后决定择地选虫。这是十分艰苦而又十分科学的方法。他不像有些养家今秋在一地得一上品，明年就在原地守株待兔，而是根据当年情况，参考上年虫情，审时度势，选择当年收虫方针，这也是他手中出将率高的一大因素。

在我们相交中，我又深感柏良先生是一个耿直真诚、热情豪爽却又嫉恶如仇的人，与他相稔的黄进、王连仲、白峰、翁立元等诸先生均是儒雅可风。我曾亲见，他言谈处事中，对好友也不藏短，看到朋友处事不妥，他会直率劝言，不吐不快；看到朋友有事，他会热情奔走相助。但对那种沽名钓誉、言不由衷的伪君子则深恶痛绝。比如，有人将他人著作稍更改几个字，大段抄录甚至原文照搬，窃为己有，恬不知耻地自诩为虫界名流，我与柏良先生都



将此类人视同陌路，宁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人品之于虫品，其实有着很大关系，柏良先生立论之精，选蓄虫品之高，其实也是他人品的一个体现。

《山东蟋蟀谱》的问世，与《秋战韬略》可谓珠联璧合，精博相彰，对广大蟋蟀爱好者而言，可谓一大福音，对推进蟋蟀文化的发展也是一大贡献。

柏良先生曾赠我一首三言诗：择沃土，储苍虫，分段育，察三变，操蛉性，识斗限，慎举将，折桂冠。细品之下，我认为这是他对鲁虫选养斗经验高度概括，其间大有学问，也是柏良经验中与众不同的特色。这些特色在两本书中都有充分论述，不需我来赘述。读者细读这两本书，相信会常读常新，不断地有所进益。

希望柏良先生和读者不以我一己之论为唐突，就权以为序吧！

肖 舟

2002 年 5 月

观察的技艺



—— 序 2

（一）

19世纪，西人法布尔尽毕生之力，成就十卷《昆虫记》，以散文的笔法对诸多昆虫的生态习性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以及人性化的描述。由于他在活态昆虫上的研究具有不同于昆虫解剖学的特殊价值，法兰西研究院授予了他“实验生理学奖金”。甚至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向人们提起此人时，称之为“难以效法的观察家”。此时为1859年，距法布尔整理出版《昆虫记》之第一卷尚有20年。

法布尔晚年为十卷本《昆虫记》所写的简短序言中有这样几句话：“阅尽大千世界，自知虫类是其最多姿多彩者中之一群。即使能让我最后获得些许气力，甚至有可能再获得几次长寿人生，我也做不到彻底认清虫类的益趣。”

法布尔一生贫困，无论其作品还是他的一生，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深得后世敬仰。此处于中西文化不同的格物致知之道，乃至其背后的精神实质、文化指向存而不论，仅从文献学的角度或者从生物观察学的角度观之，中西文化的阻隔，不论对法布尔还是对《昆虫记》，都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法布尔生活的年代，尤其是其从事昆虫学研究的年代，与中国的晚清相埒。他立志要成为一个昆虫学家是18



岁的事，这一年是1841年，为中英鸦片战争之次年，《昆虫记》第十卷问世是在1910年，此时为中国辛亥革命之前一年。这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一个时期，但对话双方却无法对等。国体、国力、制度、文化的优越感，使西方列国没有任何心情聆听并传达东方老人的喃喃自语。于是中国民俗文化中源远流长的“蟋蟀文化”便只能与西方文化中这位杰出的“知音”擦肩而过，失之交臂了。

倘非如此，如果一百年前法布尔有缘读到先他数百年前中国人完成的有关活体蟋蟀观察研究的专著，真不知对他会有何等的震撼、启发和助益。

法布尔一生致力于研究“昆虫本能的性质”，有关蟋蟀的观察见诸《昆虫记》第六卷《蟋蟀的地洞和卵》、《蟋蟀的鸣唱与交配》。然而在中国的蟋蟀谱中，有关蟋蟀习性的考察成果，远非法布尔能及，尤其是对蟋蟀自然好斗之天性的外化特征所作出的深刻体察，以及极详尽的分类和归纳总结，更是匪夷所思。其研究的深入、细致，今日西方之博物学家亦难以想像。

中国文化中对于蟋蟀习性的关注，最早见诸文字者，当属2 000多年前的《诗经》，其《豳风·七月》有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中



国古人对动物以及昆虫习性的观察和认识虽无完整系统，但却瞩目良久。这在有着“天人合一”思想背景的农业文明系统中，合乎逻辑，并不突兀。只是后来人们何以能对蟋蟀好斗的自然天性有如此深入之挖掘，对其斗性、斗品与生相的对应关系有极精绝的认识，遑论西哲，既使我辈深好此者观之，亦感觉有如神授，当真不可思议。

王世襄先生辑《蟋蟀谱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收录最早的虫谱为《重编订正秋虫谱二卷》，系嘉靖丙午刊本，时为公元1546年。此时去法布尔从事昆虫研究300年。畅安先生说的有理：“书名‘重刊’知前此尚有刻本”。民间皆以贾似道撰《促织经》为最早研究斗蟋之专著，虽至今仍未见可靠版本为证，但贾似道玩斗蟋蟀却是事实，且南宋时蓄养蟋蟀之器物亦能见诸考古发掘之实物，王世襄先生《秋中六忆·忆器》篇曾有提及。

(二)

人类对于同出于大自然的昆虫好奇，并有观察、研究的兴趣，乃至于热衷，似与人的自然天性有关。但中西文化不同的指向，却使共同的爱好大异其趣。其间曲折，当系中西文化形态比较之课题，此处不叙。



蟋蟀虽毫末身躯，但在中国文化中承载了相当的负荷。自《诗经》肇始，唐诗、宋词中蟋蟀鸣唱之声不绝于缕。

唐时已有蓄虫之风习，但后宫佳丽以金丝笼蓄之仍不外乎聆其鸣唱。自宋以降，风气为之一变，蟋蟀从诸多鸣虫中分离出来，以咬斗争胜为主流，其间中国社会起起伏伏，改朝换代，包括由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建之元、清两代，斗蟋之风亦延绵不绝，遂成中华独特之民俗源流。

言及斗蟋之风，毁誉不一。“玩物丧志”虽非特指玩虫风度气，但贾似道玩虫误国，难脱干系，多为后人所诟病。但持怡情养性之见者亦大有人在。苏东坡玩虫却未见其丧志，且有大江东去之豪情；倪云林携虫出游，而山川秀色常汇笔端。非此文人雅士一族，民谣有 蟋蟀瞿瞿叫，宣德皇帝要”之句，景德镇珠山路、中华路之明代御窑厂遗址曾出土宣德官窑蟋蟀罐两宗，依明制此系专为皇家所制，断非民品。亦可见宣德皇帝除却大烧青花瓷器祭红瓶之处，玩虫亦是一端。但宣德一朝，实属盛世。此系玩虫之德乎?可见国运兴衰，实与虫无干。

传统之民间观念乃至时下之影视剧，常常将国运兴衰，社会之变迁起伏，归咎于帝王之圣明、昏庸，大臣之忠、奸，亦或妖女祸国。凡此种种，固然于历史事实有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多关联，但实为缺乏历史纵深眼光之浅见。依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之大历史观，一朝一代的兴衰，必是其当日的制度已到山穷水尽之地步，无力应付社会之大变局，此远非帝王、臣子个人的贤愚得失所能解释。社会结构、制度安排的层面才是史家及后来人所应着眼的重点。故此将世道兴衰归咎于虫，实为大谬。但玩虫之风既成源流，且资料良多，倘以法国年鉴学派之眼光，亦足以纳入史家之视线，收为社会史研究之素材。

黄仁宇先生放宽历史的视界，以《三言》中有关商人行迹之细节，研究明代经济形态，以补《明史·食货志》资料之不足，质疑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实为慧眼独具。台湾学者陈正祥先生追寻地方志所载虮蜡庙之沿革，观察历代蝗灾分布情形，亦系善用文献之高手。斗蟋经谱、史料，涉及当日物价、风习、蟋蟀品类变迁之处甚多，一种风习相沿数百年而不衰，且裹挟者甚众、跨地甚广，又能超越当日社会阶层，成为上下普遍之爱好，如此民俗现象，在未来学者手中，当另有跨学科研究之价值。

（三）

斗虫之风习既久，自有其迷人之处。由此而引出的善



恶美丑、悲情喜剧，所体现的依然不外是世态民情、苍茫人心。

既是斗虫，众人一心，无不争胜。然则你胜则我败，无可逃脱。其斗场心情，非此道中人不能体会。而斗虫之人，又兼有怡情赏玩者、赌场争斗者、意气相搏者、鬻虫求利者间杂其间，各不相同。故此玩虫者亦是三教九流，趣味迥异。好虽同而道则相去甚远。虽如此，争胜之心众人皆然，而一己经验之积累，非一朝一夕之功，其间所付辛苦、代价，自不待言。故此于相虫、择虫之道，佳虫之产地，养虫之要诣，各路蛩家皆隐而不彰，遂成私密。期以奇兵致胜。然则百日之虫，应时生灭，风水轮转，眼光、缘份，缺一不可，即使贵为天子，虫坛将军，也未必尽入其彀。何况尚有泛变之体察，以及喂养、配雌功夫、排兵布阵、适时出斗等技艺，与伯乐相马兼兵家之运筹帷幄，相去未远，实非以一、两长技即可争一秋之短长。此犹如以独门暗器，伤敌数将尚有可能，然于两军相抗，则断难取胜。此道实深不可测也。尝有执理发业者，为人风趣可人，悬联于馆前："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倘此联转赠斗蟋一道，虽损幽默意蕴，但论其言论则贴切无比。



历代皆有具大胸怀者，不记一己之得失，重在探险究，重在求证，以文化积累为着眼，承数代之余泽，加一己之心得，刊布于众，分享其经验，以不负自然之奥秘，展现造化之神奇。

柏良先生，济南名士。民国生人，长于名门。幼时家境恢宏，器局开阔，故有机缘结识上辈名流。

先生少时机敏好学，于篮球、书法、乐器亦多有才艺。及长，受家族背景所累，难有施展。十年动乱亦不免充作苦力。然其生性高洁，傲骨长存。生不逢时，遂以清流自居。因少时即结识刘冠三等济南大蛩家，深得其中三味，故痴心养虫，以虫会友，心中郁闷，唯虫可慰。其识虫，养虫技艺遂大为精进。文革后，曾出任厂长、外贸公司总经理、外经委副主任等职，一度中断养虫数年。及至退休赋闲，乃重拾旧日情怀，仍宝刀不老。虽沐雨经风半生，其为人依然长枪大戟，爽直痛快，豪气不让少年。此得之于蟋蟀之将军者乎？

先生于虫友故交，虚怀若谷；又能于三教九流之中，持论公正，伸张正气。故此人望极高，乃成八方领袖。又见先生于乡野虫市，于虫贩亦能平等待人，公平议价，童叟无欺。虫贩亦以能售虫于先生为荣。



柏良先生蓄虫历年不过百，而出将则二、三十，近几年来游斗鲁、沪、杭等地，颇多佳绩，胜率多为十之八九。偶言及早秋收虫之数，诸多虫友或以为不实。实则先生坚持收虫在精不在多，调养、驯斗因虫而异，又能识虫本性，适时而出斗，故有佳绩。

柏良先生鲁虫之识见，独到之处甚多。1997年，其第一本专著《秋战韬略——鲁虫的相选、调养、驯斗》出版后，颇为虫友所重。蟋蟀古谱，以南谱居多，所述要点，亦以南虫为本。今人斗虫，唯重鲁虫。柏良先生深得天时、地利，近几年来，常有虫友慕名寻访，亦或书信问询，进一步探求鲁虫特点。先生遂作《山东蟋蟀谱》以补前著未尽之内容。此般胸怀，非学者风范不能为，与赌徒之心态，相去万里。非仅于此，究其著作缘起，实则另有悲天悯人之一端。

柏良先生曾言及，某年有虫友邀其遴虫，时在早秋。其欣然而去，愤然而归。却原来一干人众全然不顾虫之是否到性得时，只管克虫，以一敌三者留，败者俱投热汤之中。其中不乏冷虫之上品，入冬之将军。先生心下大恸，劝阻不动，遂拂袖而去。于是虫市之中，朋友聚会，常见先生诲人不倦；何为冷虫，何为到性，不厌其烦。又谆谆



教曰：老将军封盆养老，不可缺水食；败军之将亦应及早入土归元，放生荒郊大野。言之切切。有时尚危言耸听，此事关诸来年虫运，不可不为。

言论所及，毕竟有限。因不识虫性而误虫、害虫者众多，先生遂起著书之念，以毕生之技艺换取敬惜生命之理念，大慈大悲之心具矣。此著书之内心动因，读者不可不察。但愿读者能识仁心，得雅趣，以慰先生之苦心。

先生此作，于秋虫爱好者多有助益，尤于实战一道，助益良多。细察先生书中所述，虽体系仍沿习古谱，但内容却不囿于古谱。有关识虫、养虫之道，无不出自亲身验证。其作多有发前人未发之见，且于古人识见，与今日情形尤其是鲁虫之情形不合之处，亦多有匡正。此般经验，俱得之于先生五十年之恒久观察与总结。

观察能力是人类认识世界最基本的能力，由观察事实而归纳、总结，排除偶然性，寻求普遍规律，是为认知之道。科学发现亦以此为基础。或曰，民俗风习，一介小虫，不过草木一秋耳，是否有如此细致研究之必要?反观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多数，对于普遍的社会生活亦非有直接意义，而仅只是展现了人类在某些领域所能达到的极限水平而已。对万事万物永远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及雄心壮



志的永不满足，乃是人类能力不断延伸的动力。人类历史上由于观察力而获取的知识成果数不胜数，开普勒通过观察，证实并修正了哥白尼的“日心说”，麦哲伦之所以敢于做环球航行，除却技术上的支持以外，在于他深信地球是圆的，如此理念，主要来源于一项观察，那就是远洋的航船在人们视觉中提供了地球表面的曲率。人类对于大自然的知识就由此点滴之间，不断叠加、积累而成枝繁叶茂之体系。世界各民族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现”有不同的趣味、指向、运势和功用，亦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区别，但深入探求一切未知的领域，却是人类千古不变的愿望。

值此信息时代，各民族文化之交流、融合、梳理、整合已开前所未有之前景，柏良先生之著作，虽言论不过一虫，但体现的仍是人类对大自然永不止息的好奇和探索之心态，同时亦以特殊角度折射环境、生态、风习、昆虫品类之亦迁。倘为后世民俗文化学、生态学、社会史家提供一份见证，亦功莫大焉。

白 峰

2002 年 5 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